

---

# 晚清湘学的学术追求

朱汉民<sup>1</sup>

**【摘要】**:晚清时期的中国正是儒学及其中国传统文化走向衰落的时期,作为儒学地域形态的湘学却似乎在逆势上升,推动了“近世纪湘学与日争光”局面的形成。湘学能够在中国近代逆势上升,关键在于湘学学者既能够坚持中国文化主体性、又能够兼顾思想文化的开放性。晚清湘学对近代中国作出了重要思想贡献,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学术对社会的影响。

**【关键词】**:道治 湘学 儒学地域形态 文化主体性 开放性

**【中图分类号】**:B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675(2018)06—020—03

## 一

中华传统学术文化博大精深,既体现为不同时间段的学术思潮,又体现为不同空间态的学术形态。“湘学”是中华传统学术的地域形态,是湖南地区所形成的传统学术文化。“湘学”的“湘”是指湖南行政区划的地域空间,此“学”是指具有学理意义的传统学术思想。

“湘学”是一个历史形成的概念。宋代就出现了与“湘学”相关的“湖湘学”“湖南派”的地域学派的概念。朱熹评论胡宏、张栻的理学思想,将他们称为“湖湘学者”“湖南学”“湖南一派”等。黄宗羲、全祖望在编纂学术史名著《宋元学案》时肯定并沿袭了朱熹的“湖湘学”“湖湘学派”“湖湘学统”的称谓。到了清代、民国时期,一些学者在研究湖南地区学术文化史的时候,比较普遍地使用“湘学”概念,从而逐渐形成了中国学术史分支的“湘学”。

关于湘学研究的历史已经很久。早在南宋湖湘学术兴盛之时,湘学就开始被学界关注并成为学界思考、讨论和研究的对象与话题,朱熹的《知言疑义》就是一部研究、评论湘学的著述。从晚清到民初,湘学现象受到学界的关注,留下一些文献与论著,如李肖聃《湘学略》、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等。当代学界有关湘学的著作越来越多。

根据湘学的缘起、发展、衍化过程,可以将国学地域形态之一的湘学的历史脉络分为楚汉渊源—两宋成型—清代发展三个主要阶段。从历史演变的过程和结果来看,近代中国正好是儒学走向衰落的时期,作为国学地域形态的湘学却似乎是逆势上升,出现了“近世纪湘学与日争光”的局面,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湘学在近代中国的思想贡献又涉及哪些方面?本文希望从这些问题出发,简要论述湘学的学术特色和思想贡献。

从外在的文化流动过程来看,近代中国的学术思想是不断受到冲击、外来的西方思想不断涌入的过程;从内在的文化建构来看,则又可以将其看作是中华民族通过不断吸收外来学术文化,从而推动中国学术思想的近代重建过程。由此可知,中国学术近代化的推动者就是儒家士大夫,他们往往能够既坚持中国文化主体性,又有思想文化的开放性,故而努力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湘学能够在近代中国逆势上升,能够最大程度发挥学术对社会的影响,就在于湘学既坚持中国文化主体性、又有思想开放性的特质,对近代中国作出重要思想贡献。

## 二

---

**作者简介**:朱汉民,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长沙,410082。

---

章士钊曾经这样谈到湖湘士大夫的性格特点：“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这句话虽然是谈论湖湘士大夫的性格，但是也形象地表达了湘学学者的学术性格。确实，尽管湘学学者是引进近代西学的倡导者，但是他们总是能够坚持中国文化主体性，具有对中国传统学术理想的执着与自信，并且具有坚持这一学术理想、价值理念的坚强意志。

宋代以来，湘学学者一直表达出强烈的“正学”即正统儒学的追求。他们心目中的“正学”其实就是一种理想范型的儒学，即应该是道、治、学的完备和统一。这一“正学”中的“道”，是关于个人、家国、天下的一整套价值与信仰体系，“治”是一种参与社会、实现理想人间秩序的实践活动，“学”是一套包括道与治在内并有一定自洽性、系统性的知识体系。湖湘学者坚持儒学学统的正统性，从宋代湘学形态的成型，到清代湘学的崛起，均追求合乎儒家理想范式道、治、学的融通。我们知道，晚清学术史往往出现这样的特点：倡导宋学者常偏于“道”的传统坚守，主张今文经学者常偏于“治”的政治功用，而长于古文经学者常偏于“学”的纯粹学问。晚清湘学也包括这三大主流儒学学派，但是这些不同学派均同时体现出地域性的特点。在湖湘地域的宋学、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均坚持理想范型的儒学，即道、治、学的完备和统一。今文经学派魏源批判了“治经之儒与明道之儒、政事之儒，又泮然三途”的现象，希望完成“道形诸事谓之治”“求道而制事”“以经术为治术”的道、治、学紧密结合。他对知识学问的追求，总是与“治”的政治功用与“道”的传统价值紧密联系在一起。晚清受今文经学影响的谭嗣同也是如此，他在谈到《仁学》的学术旨趣时说：“约而言之，凡三端：曰‘学’，曰‘政’，曰‘教’。”谭嗣同的“学”具格致之学的知识内涵，“政”具“兴民权”的制度建设，并且“仁”则是代表儒家传统价值信仰的“教”，“仁”可以统摄三端。宋学派曾国藩的礼学、礼治、礼义，就体现出道、学、治贯通的儒家理想，他努力通过“礼”去实现道、学、治的贯通。他的礼学已经实践化为一种礼治的经世活动与制度建设，他的礼治又是以深厚的礼学为思想基础与学术依托，而他的礼义信仰又贯通在礼学与礼治之中。这样，曾国藩的礼学有了不同于其他礼学家的学术特色，他的礼治有了不同于其他军政大臣的风貌；同时，他的礼义信仰则具有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和社会实践基础。古文经学王先谦就不仅仅局限于诂经考史的工作，而是坚持儒学的理想范型即道、治、学的统一。

湘学学者具有对学术理想坚持的强悍意志。由于自然地理、血缘遗传、人文历史的综合原因，湖南地区形成一种特有的民性、民风。这就是历朝历史典籍、地理方志等书上所描述的湘人的性格、气质，即所谓的民性、民风，即史志上所反复说到的“劲直任气”“人性强悍”“任性刚直”“刚劲勇悍”“其俗慁悍”等等。这种“民性”与“士习”的渗透与融合，使湖湘之地成长了一大批成功将民性与湘学结合的湖湘士人，他们将儒家理想范型的追求渗透到其“南蛮”的心理气质层面。如曾国藩、左宗棠、罗泽南、郭嵩焘等湘军将领就以其“南蛮”的气质去实现儒家的道、治、学。曾国藩大讲所谓“书生之血诚”“忠义血性”“拙诚”，其“血诚”“血性”“拙”是属于以生理心理为基础的南蛮气质，“诚”“忠义”则是以儒家道德修身为基础的精神文化，两者的渗透与结合，就构成湘军将领普遍追求、表达的“忠义血性”的精神气质。曾国藩在总结湘军成功的原因时说：“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载而勘大乱，非拙且诚之效与？”

### 三

湘学既坚持儒家正学的思想体系是道、治、学的统一，又特别强调这一个思想体系是开放和与时俱进的。“道”涉及“王道”“大同”的价值理性，“治”表达经世致用的工具理性，为了推动中国文化近代化，湘学能够既以实用理性的态度引进西技、西术，又能够以价值理性的态度在吸收西学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文化的主体性重建。

湖湘文化的近代化是从晚清湖湘的两个儒家学派和儒家士大夫群体开始的。以魏源为首的晚清今文经学派和以曾国藩为首的理学经世派，尽管这两个学派的学术师承、学术宗旨各异，但是经世致用则是这两个不同士大夫群体的共同追求，并且也均是由这种经世致用的实用理性而选择了对西方科技文明、物质文化的学习与引进。他们“以实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实”的“实功”追求，能够从经世致用的社会功用、实用理性的角度，将西方坚船利炮吸收到传统中国的治术中来。他们以追求“永远之利”的实用理性精神，大胆推动中国近代化运动的洋务运动。从追求事功的实用理性出发，引伸出必然变法的要求，维新派也是从“政术”“功利”的实用理性角度，来看待、评价西方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革命派之所以选择革命道路，追求民主建

---

国，主要不是对个人权利、个性自由等“天赋人权”的追求，而是将民主、共和、宪政等政治制度的近代化追求视为实现民族自强、救亡图存的求“治”手段。可见，湘学的开放性充分体现在其“学”的知识体系和“治”的政治体系。

其实，湘学的开放性不仅体现在“学”与“治”上，还体现在“道”的价值体系的建构。湘学学者以价值理性的态度，倡导中华文化的主体性重建，也包括道的建构。两千多年以来，儒家士大夫追求的“天下有道”的价值体系，一直包含着理想与现实的两个不同层面。湖湘士大夫是推动中国文化近代化的主体力量和核心人物，他们不仅以实用理性的态度强调对西方文明的引进，同样坚持以价值理性的态度倡导中华文化的主体性重建。他们希望将中国的近代化与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建构联系起来。魏源倡“师夷长技”如果是基于他实用理性的话，那么他赞赏、推荐的欧美民主政治，则源于对三代理想的价值理性的向往。魏源的胸中一直深藏着这一“三代以上之心”，他说：“君子之为治也，无三代以上之心则必俗，不知三代以下之情势则必迂。”郭嵩焘的近代化追求，还与政教风俗的制度文化、思想文化相关。他所倡导的中国文化近代化，是对“三代”的“有道之世”的文化回归，他将吸收、学习西方近代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重建结合起来。谭嗣同所追求的近代化目标，最终是回归到孔子的仁学、大同社会的中国士大夫的价值理想中去。这一理想就是尧舜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自由，以及政治上的民主。晚清民初的许多湘学学者向往社会主义，他们在承担救国救民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时，主张将社会主义追求与回归儒家理想的“三代”“有道之世”“大同”统一起来，用以最终解决中国近代化与中华民族复兴问题。

#### 参考文献：

- [1] 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M]. 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6.
- [2] 钱基博. 近百年湖南学风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
- [3] 朱汉民. 湘学原道录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